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 与禁毒研究

A Study on the Harm and Control
of Drug in Gansu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尚季芳 © 著



人民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D693

D693.98
11

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 与禁毒研究

尚季芳 ◎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 / 尚季芳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01-008720-7

I. 民… II. 尚… III. 禁毒—研究—甘肃省—民国 IV. D69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2669 号

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

MINGUO SHIQI GANSU DUPIN WEIHAI YU JINDU YANJIU

尚季芳 著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安新文

封面设计:阳洪燕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65289539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20.25

字 数:319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8720-7

定 价:39.8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我没有考证过毒品问题是人类社会的痼疾还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却知道就中国而言，这一问题渊源有之，是“舶来”而非古已有之。19世纪以来，标榜“文明”的西方国家为打开中国紧锁的国门，从事非法亦非道德的鸦片贸易，毒品问题才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然而，由于自身制度及社会存在诸多问题，从清代道光朝开始，统治者虽采取措施禁毒，但成效不彰。中国社会经济乃至民众生活深受毒品之害，而中国西部则是毒品的重灾区。

逮至民国，毒品在中国西部进一步泛滥，僻处西北一隅的甘肃更是深受其害，种植、贩运和吸食毒品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对民生及社会经济的影响，至大且深。就种植而言，甘肃省鸦片种植一度与产烟大省云南、贵州、四川、陕西齐名，所产“西土”，行銷全国。就贩运而言，由于中央政府对甘肃省未能实现有效控制，无法彻底贯彻禁烟政策，各种商号利用马帮、驼帮、脚户，把鸦片贩运到全国各地。割地称雄的大小军阀也成为贩烟的重要群体。不仅马步芳兄弟利用军队贩烟，大发其财，就连受命担任西北边防督办且标榜信奉西教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亦动用军队，实施武装鸦片贩运。至于吸食，问题更加严重。1930年，一位旅行者对甘肃吸食鸦片的状况作了如下描述：“一进甘肃的交界，那真好像入了云雾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十家之内有八家总是云烟缭绕，一家之内，老子有老子的灯，儿子有儿子的灯，媳妇有媳妇的灯，听差还有听差的灯。一家商店里上自掌柜职员，下至工匠学徒都各有各的灯，所以凡是西北的男女老幼，大部分总都会吞云吐雾。”

这类文学性描写得到那时大量社会调查结论的印证。据时人调查，20世纪

30年代,甘肃省属之酒泉县有人口九万,“十人之中,足有七人吸鸦片”;在康县、西固,烟民占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在榆中、平凉、庆阳等地城镇,吸食者占总人口十之三四,乡村吸食者亦占十之一二。甘肃毒品问题是整个国家毒品问题的一个缩影,它凸显了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的严峻性。终民国之世,尽管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毒品问题的解决,但成效甚微。

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府厉行禁毒,敦化风俗,危害国人百余年的毒品问题才得到有效控制。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取得经济及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与其他地区一样,毒品问题又在中国西部沉渣泛起,且愈益显示出更加广泛的国际性和复杂性,而甘肃则被列为中国六个“毒害”严重的省份之一。严重的毒害已危及国家的稳定与社会和谐。加大毒品查禁力度,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给人民提供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季芳博士以近代甘肃毒品与禁毒作为研究课题,对甘肃省毒品肆虐的原因、过程及历届政府禁毒政策之得失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力图为当今甘肃乃至全国禁毒提供历史事实以为借鉴,适应了弥补史学研究缺憾及服务当今社会现实的双重需要。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笃实。作者对关涉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的一些重要事实,如鸦片种植面积、种植地域、吸食人数、吸食年龄、吸食阶层、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等,均进行了严格考证,为读者再现了那时甘肃毒祸泛滥的完整明晰的历史影像。以此为基础,作者对鸦片与民国时期甘肃财政、鸦片与民国时期甘肃军政格局、鸦片与民国时期甘肃农村经济、鸦片与民国时期甘肃社会次生群体、民国时期历届政府查禁烟毒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史实重建和分析论证,提出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观点。

作者认为,鸦片之所以在民国时期的甘肃泛滥,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不可忽视:其一,甘肃省财源枯竭,政府将鸦片收入作为财政支柱;其二,军阀林立,军费浩繁,统治者以烟亩罚款为军费挹注;其三,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权势不固,社会严重失控;其四,地方实力派(如马氏军阀)植根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宗教和社会土壤,借助毒品,大发其财,政府无力驾驭;其五,甘肃近代化水平低下,工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迟缓,支撑社会发展的良性经济结构尚未建立,地方造产功能有限;其六,部分民众因生计困窘,不得已走上种烟一途;

其七,政府以鸦片为谋财路径,所采取的“禁税并重”、“分期禁绝”等禁毒政策,似禁非禁,失去了法令的权威性,以致毒品屡禁不止。此外,西北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复杂为毒品蔓延滋生提供了条件,日、俄、英等外国势力插手西北事务又使毒品禁绝难上加难。为增强说服力,作者还特设章节,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禁烟禁毒政策进行描述和解读,并与国民政府时期的禁毒政策进行对比,彰显两个时代对毒品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加深读者对民国时期甘肃省毒品泛滥原因的认识。历史事实的还原及周详缜密的学术解析,为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史的深入研究构筑了一个崭新的学术平台。

史料发掘与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成败或成果的价值。尽管前人在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史的研究上已取得一定成绩,部分论著也颇具学术价值,并为本书的研究作了铺垫,但诚如作者所言:既有论著所引资料“取自档案者极少,对当时的政府出版物及时人创办的报刊也多未利用”;又有因缺乏资料,“多数文章缺乏说服力,在问题的探究上,很难达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等问题。为改变这一状况,作者在搜集资料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本书绝大多数资料来源于甘肃省档案馆,并辅之以兰州市档案馆、甘肃省图书馆、兰州市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和图书资料。与此同时,作者使用了《甘肃省政府公报》、《西北日报》、《甘肃民国日报》、《和平日报》等报纸资料及时人所作西北考察报告与游记。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不辞辛劳,实地调查走访甘肃毒品泛滥的重灾区,采访民众,咨询部分健在的民国时期任职甘肃省的官员,获得了宝贵的口述史资料。由于历史资料来源广、数量大,既能发挥纠错补漏之功,又能展示开拓提升之效,使作者能够将毒品泛滥的史实及相关社会面相一一厘清,为本书成为“信史”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姑且不论作者分析论述“段位”的高低,单是上千万字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对于近代中国毒品与禁毒史的研究,已经是作了很了不起的贡献了。

从学术史的立场上看,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西部毒品史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此前中国的毒品史研究,无论资料发掘还是问题探讨,东南沿海、华北和西南等地区均走在前列,而西北则相对滞后。就我目力所及,以往有关西北地区毒品与禁毒的文字大多是些时人游记及散在政协文史资料或地区方志

里的零星记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则可,当做信史则不行。近年来,站在研究立场上就此问题发表的学术论文,则基本属于见缝插针式的“空白填写”,虽于个别问题的厘清不无裨益,却难窥甘肃省毒品问题的“全豹”。尚季芳把民国时期烟毒大省甘肃作为考察对象,参与开拓近代西北地方史、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为近代毒品史的区域化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个案支撑。从学术地缘性的角度审视,本书出版之前,秦和平教授曾对云、贵、川三省的近代毒品史作过深入研究。秦教授的关注重心在西南,季芳博士关注的重心在西北,并秦、尚二人的著作观之,中国西部毒品与禁毒的历史著述,庶几达于完整,这对近代中国毒品史研究,可谓有力的推进。

季芳自200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川大攻博,与我一起学习探讨近代中国历史。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质朴,无论其言其行,均无任何修饰。在学习上,似乎是因为来自西北的缘故,透露出一种内地人身上罕见的饥渴感,寻求“饮食”的欲望异常强烈。我曾经去过陕西、甘肃及新疆等西北地区,发现黄土高原及沙漠戈壁上的树木花草,因为缺水少肥的缘故,必须把根扎得很深。这当然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然而正因为根系发达,故西北地区的树木花草往往比内地的植物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果实也格外甘甜。三年学习期间,季芳就像是黄土高原上的一棵树木,拼命向学术的地底深处扎根,以摄取各种养分。因为根扎得深,摄取的养分多而广,故能如期结出丰硕的学术果实,以较高质量完成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列入教育部《高校社科文库》,获出版资助,表明他此前的努力已受到学界重视。作为师长,我为他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愿他保持西北汉子做人及做学问的本色,志存高远,埋头耕耘,推出更多的学术成果。

杨天宏

2009年8月于四川大学

序二

2005年,我应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王劲教授的邀请,前往该校为历史系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授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由于当地高校不少师生曾读过我的著作和论文,所以,当他们得知我来兰州后,也相率列席旁听了我的讲课。因此机缘,我有幸结识了西北师范大学的尚季芳同志。

经过多次接触,我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知道他是著名学者杨天宏教授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现在是西北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近代西北地区社会史,尤其是鸦片烟毒问题的研究,并在国内多家报刊发表了论文,目前正集中精力,撰写民国甘肃地区毒品史一书。在他的热心安排下,我应邀为他所在学校师生作了两次学术讲演,通过与他们校系领导的接触,知道他是位优秀的青年才俊。他为人谦和礼貌,治学严谨刻苦。这些使我对他倍增敬意,从此成了好朋友。

今年8月,季芳同志来信告诉我,说他有关民国甘肃地区毒品史一书已被列入教育部《高校社科文库》,将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希望我能为该书写序。我接信后,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当然慨然应允。

综观全书稿,包括“绪言”在内,一共九章,洋洋数十万言。此书历述了民国时期甘肃地区鸦片种植情况,吸食鸦片的人数、阶层,鸦片贩运的途径、路线,鸦片烟毒给甘肃地区造成的危害,南京国民政府及甘肃地方政府为禁止鸦片种植、吸食和贩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失败的原因,等等,它向人们展示了民国时期甘肃地区鸦片毒品史的全貌。所用资料大多来自未刊档案和政府内部的报告、文件,以及个人所作田野调查、访问,真实可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有关近代中国鸦片毒品问题,近年虽有不少著作问世,但像季芳同志这样,以甘肃地区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较为系统全面地进行论述,并不多见。因此,本书的出版不仅丰富和深化了当前毒品史的研究,而且在客观上填补了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地区毒品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

本书有关章节中,还将解放前后甘肃地区禁毒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对于近年来甘肃地区重新出现的鸦片毒品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就如何根治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本书的出版又不乏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意义,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禁毒斗争不无指导价值。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本书还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有关民国西北地区毒品史的资料。通过阅读本书,人们可以从中了解西北地区毒品历史的真相,从而进一步树立“远离毒品,珍惜生命”的正确意识。

当今中国社会正经历重大变革,在社会总体走向进步繁荣的同时,各种腐朽丑恶的现象也严重存在。金钱至上、拜物主义、贪图物质享受现象十分普遍。在学术界,不少学者有学术头衔而无实学,在金钱、物质的诱惑下,不愿去刻苦做学问,以致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现象时有发生,屡禁不止,令人痛恨。像季芳同志那样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十数年如一日甘坐冷板凳,泡图书馆、跑档案馆,在书海里遨游,孜孜求索的并不多见,难能可贵,令人敬佩。衷心祝愿他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继续奋发努力,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谨此为序。

谢俊美

2009年8月8日书于

上海武定坊北州书屋

目 录

CONTENTS

序一(杨天宏) 1

序二(谢俊美) 1

绪 论 1

第一章 国民政府建立之前的甘肃毒品问题 14

第一节 鸦片入甘及清代的禁烟 14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甘肃毒品问题 18

第二章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甘肃毒品问题 27

第一节 鸦片种植状况考察 27

第二节 毒品吸食情况考察 40

第三节 毒品贩运群体及路线考察 52

第三章 毒品对民国时期甘肃社会的影响	63
第一节 毒品经济与畸形社会繁荣	63
第二节 毒品与农村经济之衰落	68
第三节 烟亩罚款与农民离村	74
第四节 吸食、自杀及其他	92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的甘肃禁政——以“六年禁烟计划”为中心 ...	103
第一节 分期禁绝政策的实施	105
第二节 对吸食者的登记管理	114
第三节 具体戒毒手段概述	121
第四节 对烟土的统一管理	136
第五章 “六年禁烟计划”时期甘肃禁政考量	148
第一节 禁烟检查团眼中的六年甘肃禁政成效	148
第二节 分期禁绝政策的种种弊端	152
第三节 禁烟经费剖析	161
第四节 禁烟法令评析	168

第六章 社会失范与民国时期甘肃禁政 176

第一节 民国时期甘肃政治格局透视 176

第二节 马家军阀与甘肃毒品 183

第三节 土匪与毒品 193

第四节 地方基层政权与毒品 199

第五节 甘南藏区与毒品种植 233

第七章 禁政与财政:民国时期甘肃禁毒再诠释 241

第一节 田赋及其征收 242

第二节 插花地、飞地与鸦片种植 252

第三节 军费与烟亩罚款 259

第四节 从民众上书看政府的禁毒态度 269

余论 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禁毒政策相比较 275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初甘肃烟毒泛滥情况概述 277

第二节 土改的彻底实施与禁毒运动的深入开展 281

第三节 群众性禁毒运动的广泛开展 285

第四节 标本兼治的禁毒举措 291

参考文献 297

后 记 307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毒品是影响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的一大严重问题。从中国的现状来看,近年来毒品问题又沉渣泛起,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甘肃省是中国西部毒品的重要集散地,被列为中国六个“毒害”严重省区之一。^①进入21世纪,甘肃省毒品问题日益突出,贩毒现象严重。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2年的三年禁毒斗争中,“全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 913起,抓获制毒、贩毒作案人员13 752名,摧毁贩毒团伙120个,缴获海洛因521.68公斤,强制戒毒40 040人次”。^②2003年至2005年,甘肃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3 677起,抓获制毒贩毒作案人员4 104名,缴获毒品海洛因450.358公斤、鸦片89.783公斤。^③2005年到2008年,甘肃省公安机关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3 800多起,抓获制毒贩毒作案人员4 500多名,缴获毒品海洛因近180公斤、鸦片90多公斤、新型毒品近10公斤。^④可见,截至2008年,甘肃省禁毒形势依然严峻。甘肃毒品犯罪的重

① 殷春永:《甘肃吸毒人员增加,三年破获毒品案件1.2万余起》,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2003年4月24日。

② 严彤:《甘肃毒品犯罪的新形势及应对》,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90页。

③ 王富祖:《法制视点:回顾我省“禁毒三年规划”实施成就》,载《甘肃日报》2006年6月22日第6版。

④ 刘薛梅:《甘肃省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率全国领先》,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2009年2月12日。

灾区集中在省会兰州市和临夏的广河、东乡等县。从2000年到2003年,兰州市共破获毒品案件7582起,占全省破获毒品案件总数的58.6%,缴获海洛因209.36公斤,占全省缴获海洛因总数的40.1%。^①2003年以后,兰州市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强缉毒破案,截至2005年,共破获毒品案件1765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3879人,缴获海洛因244公斤。^②缴获的海洛因数量与2003年相比,明显上升。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和广河县也是如此,两县都“已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三甲集镇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之一。三甲集镇的毒品吞吐量一度是非常惊人的,以车皮而非人次计算”。^③此语虽有夸大之处,然毒品犯罪的迅猛发展,给甘肃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则是不争的事实。

从吸毒方面看,甘肃的吸毒人数居高不下。据统计,全国吸毒人数最多的省份集中在四川、贵州、广西、云南、陕西、甘肃和重庆等西部地区。^④2004年,甘肃省在册吸毒人数约4.5万人,估计实际人数在8万人左右。^⑤截至2005年年底,全省吸毒总人数为46530人,所有在册吸毒人数在500人以上的县已达27个。^⑥吸毒的重灾区临夏和兰州的吸毒人数占全省吸毒人数的2/3。^⑦大量吸毒人口的存在,不仅使吸毒者家破人亡,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治安、刑事案件。

在毒品的原植物种植方面,甘肃省的形势也非常严峻。1988年发现有6个县市种植,到1996年已发现有14个县市种植。^⑧种植的地域主要集中在“定西、临夏和甘南等地的交界山区,甚至个别地方的种植已经半公开化”。^⑨2000年以后,甘肃省加大了对毒品种植的打击力度,种植地域明显减少,但在陇南、甘

① 严彤:《甘肃毒品犯罪的新形势及应对》,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90页。

② 刘志广:《访兰州市禁毒局局长何全意》,载《兰州晨报》2006年6月26日第9版。

③ 穆撒:《甘肃毒品状况调查》,载《文摘报》2004年10月24日第8版。

④ 郭建安:《吸毒违法行为的预防与矫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⑤ 郝远:《提高认识,狠抓落实,全面推进我省艾滋病防治工作》,载甘肃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gansu.gov.cn>)2004年5月31日。

⑥ 赵汇:《2008年年底甘肃省将建27个门诊》,载《兰州晨报》2006年11月15日第9版。

⑦ 田世荣:《甘肃省禁毒形势依然严峻》,载《甘肃经济日报》2005年6月24日第1版。

⑧ 李波阳:《甘肃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及防治对策》,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15页。

⑨ 吕天:《邪恶的罂粟——20世纪毒品问题扫描》,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

南的一些偏僻县,受境内外毒情的影响,仍发现有零星种植区域。如宕昌县一些偏僻乡村,近年来有种植鸦片的现象,鸦片种植致使一些乡镇一时毒品泛滥,禁毒工作处于被动局面。^①迭部县洛大乡录坝村也发现少量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情况,县公安局赶赴现场勘察,共计铲除烟苗 61 株,并将违法行为人抓获。^②

面对毒品的肆虐,甘肃省加大了治理和打击力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甘肃省 86 个县市区中已有 73 个创建为“无毒县市区”,创建总体比例位居全国前列。^③尽管如此,甘肃省的毒品问题仍不容忽视,在毒品的贩运、吸食和种植方面仍然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毒品带来的危害,已经成为事关千家万户和和睦安宁、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严重现实问题。

当今甘肃严重的毒品问题与历史上的毒品泛滥有某种契合之处。鸦片自传入甘肃后,迅速在陇原大地上蔓延开来,毒祸日胜一日。从清末到民国,甘肃的鸦片种植一度与产烟大省四川、云南、贵州和陕西齐名,排在第五位,所产“西土”畅销全国。吸食上,20 世纪 20 年代末所做的一次社会调查显示,皋兰县男女吸食鸦片者约占该地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榆中约占该地总人口的十分之三四;天水约占该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平凉城中吸食鸦片者约占该城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在乡村者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庆阳吸食鸦片者约占该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男子吸食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二,女子约占十分之一。^④很明显,在上述各县中,吸食鸦片相当普遍。时人说:“甘肃人民烟枪之多,多于饭碗。”^⑤此语虽有戏谑成分,然而众多的“瘾君子”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就贩运而言,民国时期主要的贩运者有商号、军队、驼帮、脚户和马帮。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将鸦片运到本省的烟民手里或者运往外地,赚取高额利润,毒害人民。

① 李培平:《宕昌县从源头狠抓禁毒工作》,载《甘肃法制报》2005 年 12 月 5 日政法新闻栏目。

② 闫斌:《迭部破获一起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载每日甘肃网(<http://www.gansudaily.com.cn>)2005 年 7 月 7 日。

③ 刘薛梅:《甘肃省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率全国领先》,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2009 年 2 月 12 日。

④ 《甘肃省二十七县社会调查纲要》(一),甘肃省图书馆藏。

⑤ 凤玄:《卓尼归来》,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 1990 年影印出版,第 23 卷第 139 册,第 182 页。

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给甘肃社会的正常运转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清代和民国历届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禁烟措施,也或多或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鸦片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给禁烟禁毒问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时至今日,鸦片烟毒死灰复燃,影响社会和谐发展殊深。在这样的背景下,追寻甘肃毒品问题的历史渊源,分析研究民国时期甘肃毒品泛滥的状况、社会成因以及国民政府治理毒品问题政策措施之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

鸦片烟祸与民国时期甘肃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有着紧密的联系。鸦片问题可以反映或折射出诸多社会问题:其一,政府财源枯竭,无力支撑正常的机构运转,不得不依靠鸦片维持局面;其二,甘肃地方军阀林立,对省、县政府动辄干涉抗衡,军费全靠烟亩罚款和贩运税收来挹注;其三,由于无休止的烟亩罚款,广大农民被逼上了不得不种植鸦片的绝路,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大受影响;其四,一部分社会次生群体如土匪、土劣等包庇种植、贩运鸦片,地方乱象丛生,民不聊生;其五,由于现代化基础薄弱,工业、商业和农业不发达,加之交通不便,鸦片收入成为维持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柱;其六,在民风不振、世风日下的时代背景下,众多的民众通过吸食鸦片来慰藉心中的苦闷和不安,等等。很明显,鸦片是认识民国时期甘肃社会的一把锁钥;将鸦片及与鸦片相关的历史事实加以重建,并在此基础上解读与其相关的社会问题,对深入研究甘肃地区的毒品与禁毒历史乃至整个民国甘肃史,都将不无裨益。

近年来,史学研究区域化的趋势日渐明显。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发展极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因此对区域史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内容涉及全国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有效途径。否则,诚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所指出的:“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①近代西北史作为区域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在研究方法、研究路径、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及材料的着力挖掘上,与东南史、华南史、华北史都存在很大差

① 【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距,与同处西部的西南史相比也有较大不同。有人对近年来的区域史研究成果做了一番整理之后,指出区域史研究“在省区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相对发达的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地方史研究成果较多,而对内陆省份的相关研究则很薄弱”。^①这个结论包含了对西北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批评,同时也是一种激励。本书选取对民国甘肃社会有重大影响的鸦片烟毒作为研究课题,正是基于改变西部对自身历史研究不足现状的考虑,希图尽自己绵薄之力,为西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二、学术史回顾

19世纪以来,诸多研究鸦片问题的著作问世。在全国性的研究著作中,1949年前,主要有李圭的《鸦片事略》、于恩德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罗运炎的《中国鸦片问题》、陶亢德的《鸦片之今昔》、顾学裘的《鸦片》等著作。^②1949年后,尤其是近十年来,有关毒品史的著作陆续面世。有些是资料的集中整理,如马模贞主编的《中国禁毒史资料》,反映了从1728年到1949年长达二百多年的毒品倾销与反倾销的历史,是目前比较全面的禁毒史料专集;《文史精华》编辑部推出的《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收集了全国各地烟毒资料157篇,都是一些回忆性质的资料,涉及西北者甚少。^③此外,还有一些专著陆续出版。^④以

① 李玉:《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综述》,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70页。

② 李圭:《鸦片事略》,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1辑,第603~60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中华国民拒毒会1929年刊印;陶亢德:《鸦片之今昔》,宇宙风社1937年版;顾学裘:《鸦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 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 马模贞:《毒品在中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王东林:《鸦片之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版;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史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蒋秋明等著:《中国禁毒历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王金香:《中国禁毒简史》,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马模贞:《中国百年禁毒历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宏斌:《禁毒史鉴》,岳麓书社1997年版;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刘志琴主编:《烟毒兴灭》,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年版;上海禁毒委员会编:《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